

编者按

Book clip

“一老一小”是许多家庭的重要关切。近年来,各地纷纷探索“老幼共托”模式,将托老与托幼服务结合起来,既能增加老幼互动、提升双方幸福感,又能有效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利用效率。“老幼共托”模式为解决居民养老、幼儿托育难题提供新的思路,本期《他山之石》聚焦各地实践,以期银川市办好2026年民生“十心”实事之老幼养育“贴心”实事提供有益借鉴。

老幼共托,1加1能否大于2

“一老一小”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。如今,传统的养老育幼方式正面临深刻变革:老年人不再满足于基本生存保障,而是追求有品质、有尊严、有参与的晚年生活;儿童养育从单一的饮食营养、知识学习,转向对身心健康、个性发展的全面关注。在需求变化的当下,“一老一小”生活服务消费更加专业、精细、多元,对服务品质、人才供给、行业监管等提出了新挑战,家庭和社会仍然面临不小的现实压力。一边是部分托育机构、幼儿园生源萎缩,闲置场地增多,另一边养老领域却在喊“缺空间、缺人手”。一些地方尝试把两者结合起来,试点“老幼共托”,为解决养老托育难题提供了新思路。

清晨的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,托育园里孩子们欢声笑语,走廊另一边,老人们怡然自得。当“朝阳”与“夕阳”在同一屋檐下相遇,一种名为“老幼共托”的新模式正悄然生长。

一边是出生率下降、幼儿园生源不足,一边是老龄化加速、养老服务缺口持续扩大。“一升一降”之间,有人把闲置的幼儿园改成了老人活动区,有人把社区养老驿站辟出一半做托育园。当养老与托育被“塞”进同一空间,能否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?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几道坎?

当幼儿园开始“托老”

2003年,于波和学幼师专业的爱人一起,在山东济宁开了一家幼儿园。彼时大量农村人口进城,入园需求旺盛。2009年起,他们几乎以每年一家新幼儿园的速度扩张,高峰期拥有12家幼儿园。而如今,于波的幼儿园已缩减至5家,员工也从近400人减少到170人左右。“很多人认为行业前景不好,就去别的地方了。”于波说。

转折发生在2020年。那年,于波关停了3家幼儿园:“生源上不去,加上小区配套幼儿园大量涌现,公立幼儿园托幼一体化加速,要活下去就必须转型。”

于波的想法很朴素:能不能拿出一部分闲置场地让接送孩子的老人也有个去处?说干就干,只用了2个多月,他便把自家幼儿园的一栋空闲楼改造成了老人活动区。每天,老人们送完孩子,转身就去隔壁楼里打太极、做艾灸、喝茶聊天,中午还能在幼儿园食堂和孩子们一起用餐。院子里,老人做八段锦,孩子在十几米外玩耍,互相都能看到。

于波的探索并非个例。近年来,“老幼共托”新模式在全国多地兴起,“幼儿园转办养老院”等话题多次登上热搜。

数据揭示了这一模式兴起的深层动因。2020年到2025年,我国出生率从8.52‰下降至5.63‰,0岁至3岁婴幼儿数量从4200万人左右减少至不足3000万人。传导至教育领域,不少幼儿园走上了“关停并转”的道路。与之相对应的是,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。2025年末,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3.2亿,占总人口的23%,预计到2035年前后占比将超过30%。

“一升一降”之间,托育机构面临“无孩可托”的困境,而养老服务需求却在持续增加,“老幼共托”应运而生。企查查数据显示,截至5月21日,国内现存1.47万家养老托育相关企业。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呈持续增长态势,截至5月21日,今年已注册1354家相关企业。

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党委书记、主任高成运表示,随着身体机能衰退与社会角色淡化,许多老年人面临着深刻的孤独感与社会脱节感,而幼儿的纯真与活力恰是治愈良方,“老幼共托”为老年人带来了超越物质层面的、宝贵的情感满足,也为孩子提供了更多的关爱和陪伴,实现了“老幼互惠”,促进了代际和谐。

不仅是人口结构变化使然,“老幼共托”的兴起也是对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的回应。数据显示,2025年全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仅为2.52人/户,传统的家庭照护模式面临挑战。尤其是对于双职工家庭,“上有老下有小”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与照护负担是现实而紧迫的痛点。

“老幼共托”的兴起,为这一普遍性社会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。”高成运表示,在直接经济成本上,“老幼共托”带来了显著的降费效应,场地、设施、人力乃至管理成本有望实现最大化分摊,这种集约化运营直接转化为更普惠的服务价格;在间接社会效益上,“老幼共托”将家庭成员从繁重的日常照护中部分解放出来,有效释放家庭劳动力,使年轻父母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发展与自我提升中,切实减轻家庭照护负担。

是家事也是国事

作为应对人口变化的一种新型社会服务模式,“老幼共托”正在引发更多关注。2024年4月,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部门修订印发的《“十四五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》明确提出:“各地要统一规划养老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,制定城市‘一老一小’等整体解决方案。”在政策引领下,全国多地展开

积极探索。

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新北社区,养老服务驿站与德宝托育中心比邻而居。从外面看,两所机构似乎毫不相干,但其内部却被一条走廊连通起来。作为北京市首个社区普惠型养老育幼一体化试点,驿站于2024年7月改造升级,将原先386平方米的整体空间划分出一半改造为托育园。

谈及改造的原因,德胜街道办事处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吴红告诉记者,在实际运营中发现,受老年人生活习惯和作息规律影响,驿站的使用更多集中在上午,为提高场地使用效率,社区对周边居民进行了需求调研,托育服务随之被纳入改造计划。

通过增设幼儿独立入口、布置户外场地、环境软包处理等一系列适幼化改造,一个融合养老托育双重功能的社区服务中心正式亮相。在养老区域,老年人可以享受助餐、助浴、理发、陪诊等养老服务;在托育区域,全日托、半日托、计时托等托育服务可供居民选择。每周三,这里还会组织老人和孩子共同参加绘画、手工等互动课程。“这些活动有效缓解了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,幼儿也能在长者陪伴下得到关怀、学会尊重,老幼共托让‘夕阳’‘朝阳’同样灿烂。”吴红说。

近年来,在城市更新背景下,全国多地通过改造、租赁、置换等方式盘活存量空间,将养老育幼服务设施“嵌”入社区,构建起“一刻钟生活服务圈”。高成运介绍,目前,“老幼共托”已形成社区主导、园所拓展和企业运营三种模式。社区主导通过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,实现资源共享与服务叠加;园所拓展则利用幼儿园闲置空间增设养老服务,实现场地复用与代际互动;企业运营以国企或大型平台为主,打造“医养康养”一体化的民生综合体,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和集约性。

在北京,父母食堂、老年大学、托育托管等服务需求被有机整合为社区服务综合体,不仅方便老幼,更惠及全龄;在山东济宁,养老驿站“反向嵌入”幼儿园,既缓解了场地资源紧张,又促进代际交流与社区融合;在山西太原,同一空间中午为孩子提供“小饭桌”和午休服务,上午和下午则变身老年活动中心,实现了时空复用与资源共享;在广东深圳,国有平台整合资源,通过在社区长者服务中心布局托育点,一站式解决老年人“照料难”与年轻人“带娃难”问题……这些积极的探索让“老幼共托”新模式展现出更多维的价值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世冲表示,“老幼共托”服务模式有效回应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、更加注重集约高效等发展要求。面对城市空间资源紧张的普遍困境,“老幼共托”在不新增建设用地的前提下提升服务效能,既推动社区服务设施由分散配置向集成供给转变,为应对日益加剧的“一老一小”照护需求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,也推动城市更新由以增量扩张为主向存量提质增效、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转型。

理想与现实的博弈

当一些地方热火朝天地推进“老幼共托”时,另一些地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

2026年3月,厦门市思明区在答复人大代表关于推动“老幼共托”健康发展的建议时明确表示:基于硬件与合规性受限、统筹建设难,卫生防疫风险高,家长接受度低,专业人才匮乏、难以支撑模式运营三方面考量,“现阶段暂不适宜推行‘老幼共托’模式”。

思明区的顾虑点出了当前制约“老幼共托”落地和可持续运营的最大瓶颈——场地设施建设难度较大,政策监管体系协同不足,可持续运营难。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,当“老幼共托”这一新业态闯入由幼儿园、养老院、托育机构构成的传统服务体系时,新旧逻辑被置于同一空间,但相应的政策“接口”还没有准备好。

于波在幼儿园辟出区域做养老服务的效果很好,但那次尝试只维持了半年。问题出在管理上——幼儿园要求封闭、独立、人员可控,养老照料则要求开放、便利、随进随出。于波直言,“两者在管理要求上存在冲突,一方的合规可能意味着另一方的‘违规’”。

即便是在平稳运营的试点,管理上的“拧巴”也依然存在。独立封闭与空间共用存在冲突,隔离标准较为严苛,养老托幼场地设施标准不一……新北社区“老幼共托”试点委托运营方育天成(北京)托育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韩小良告诉记者,“老幼共托”多是依托老旧小区改造的嵌入式设施,场地条件受限,如果标准过于僵化,不利于发挥其激活闲置资源、降低服务成本的优势。

2025年,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围绕“老幼共

托”展开专门调研。调研显示,共托场地改造面临“双重标准适配难、改造成本高、空间利用矛盾”三大挑战。一方面,托育机构与养老机构在建筑设计规范、消防疏散标准和人员配比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,部分要求相互冲突;另一方面,共托场地需配备兼顾老人与幼儿需求的特殊设施,如防撞软包、适老化扶手、分区温控系统等。同时,老幼生活习惯、活动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异,老人偏好安静、幼儿活泼好动,共托空间功能设计也需兼顾不同需求。

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、教授李曼丽介绍,“老幼共托”涉及养老与托育两大服务领域,共托机构需同时对民政、卫健、教育等部门,但现行政策暂无明确的空间设计标准和统一的服务流程规范,机构方的沟通和运营成本较高,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,不利于行业长期发展。

即便跨过了硬件和审批的门槛,“老幼共托”机构还面临一个根本问题:可持续运营。

新北社区的试点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行,各部门的政策支持是关键。目前街道办事处租用场地免费提供给机构运营,西城区每托位3000元/年运营补贴,正在进行的民水民电改造……对于社区普惠性托育机构,这些支持尤为必要。“正是有了这些政策支持,第三方机构才可以正常运营,保证服务到位。”吴红说。

在济宁,于波第一次尝试失败后,当地街道主动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办公楼进行改造,免费供其使用。改造后的场地空间独立、互不干扰,养老服务免费向老人开放,受到周边居民欢迎。但托育端只有十几个孩子,维持运营主要靠上门服务佣金、陪诊、适老化产品销售等“副业”。“社区服务中心相当于一个引流窗口。”于波说,但引流能否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,仍是未知数。

既要懂老也要懂小

如何让“老幼共托”实现真正的代际融合?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尤为关键。

2024年9月,跟着于波干了12年幼教的宋攀开始考虑转型。“养老是‘朝阳行业’,干到退休完全没问题。”几个老师也跟着宋攀踏入养老领域,成为集团内部从“幼”转“老”的第一批探路者。

从带小孩到带老人,宋攀遇到的第一个冲击是沟通方式。她告诉记者,幼儿园要求老师讲普通话、表达清晰。但面对老人,说普通话反而成了障碍——“好多老人耳背,你说普通话他听不懂,说方言他才觉得亲近”。

更大的挑战来自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特征。知识体系的转换并不轻松。为了能在养老行业站稳脚跟,宋攀和她的团队花了两个月的时间,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证书。

“照顾一老一小,共通的东西有很多。”宋攀列举:耐心、沟通能力、观察力、组织活动的能力——这些在幼教中积累的素养,在养老服务中同样适用。但她也承认,当两个群体被放在同一个活动中时,复杂度成倍增加。场地环境的安全排查、手工活动的设计……活动进行中,老师们神经紧绷,担心老人孩子互相撞倒。“一小时的互动课,老师们往往要花两天时间准备。”宋攀说。

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,在不少共托机构,老人和孩子虽处同一屋檐下,互动机会却不多。李曼丽表示,老年人与婴幼儿在认知方式、活动节奏与情感表达上存在天然差异,这需要老师基于对代际差异的深刻理解,进行精心的内容适配、专业的现场引导和周密的安全管理,引导老幼获得更好的融合体验。

从“孩子王”到“老人伴”,宋攀的转型之路,折射的是整个社会服务人才结构的深刻变化。目前,国家尚未出台“老幼共托”复合型人才培养标准和认证渠道,全国范围内接受过“老年护理+幼儿照护”交叉培训的从业人员占比低,且多为短期基础培训,无法满足共托服务专业需求。

李曼丽介绍,“老幼共托”模式对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双重要求,但从实践看,当前养老和托育服务的从业人员均是针对单一群体开展专业服务,缺乏跨领域的系统培训和实践经验,加之职业待遇一般、社会认可度不足,年轻人不太愿意进入,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这一模式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短板。

于波的跨界创业,到德胜街道的试点探索,再到宋攀的职业转型——“老幼共托”从无到有、从点到面的每一步,最终都要落到“人”的身上。培养更多“既懂小、又懂老”的复合型人才,或许是这一模式能否走得更远的关键答案。(原载于5月26日《经济日报》)



制图:孙辉(AI辅助生成)